

保存者·开拓者·建设者

——论郑振铎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陈福康

内容提要 鲁迅曾说，郑振铎是文艺遗产的保存者、开拓者和建设者。确实，郑振铎作为保存者的及时、果断、睿智、奋不顾身，作为开拓者的异乎寻常的敏锐、超前、全方位、勇往直前，作为建设者的无与伦比的辛勤奉献、硕果累累，都是十分罕见的。然而，他有很多非常重大的贡献在有关文学史书及教科书、工具书上缺少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记述。例如，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最主要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代表人物；是《小说月报》全面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幕后英雄；是新文学30年史上长期主编全国最著名、最核心、引领全国文坛的大型文学刊物和丛书的第一人；是最早呼吁撰写完备的中国文学史的第一人和世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的作者；是发现、提携一大批著名作家如老舍、巴金等人的第一伯乐；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前身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也是左联解散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关键词 郑振铎；贡献；文学史；开拓

1934年1月某个黑夜，奋笔工作的鲁迅在所编《引玉集》的后记的最后，写到了郑振铎（西谛），并充满激情地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趋势登场……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①

鲁迅自豪地说的“我们”，当然首先就是自己和郑振铎。而今天，我们用“保存者”“开拓者”“建设者”来概括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身份，仍然感到非常确切。而且，无论在荆天棘地的旧时代，还是在光明的新中国，郑振铎作为保存者的及时、果断、睿智、奋不顾身，作为开拓者的异乎寻常的敏锐、超前、全方位、勇往直前，作为建设者的无与伦比的辛勤奉献、硕果累累，都是十分罕见的。他又无私地甘于做无名英雄，甘于做泥土，加上后来研究者的忽视，甚至还有集体性人云亦云和选择性盲视偏视的现象，

导致郑振铎有很多非常重大的贡献却近乎被人遗忘，在有关文学史书及教科书、工具书上缺少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记述。因此，在纪念郑振铎诞辰120周年和牺牲6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鲁迅说的“证明”一词，来对郑振铎的杰出贡献再作一番论证。

周予同在1957年曾经这样描述郑振铎：“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②这里提到了文学和考古学。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并为二所的首任所长。而众多的学术部门确实也不能“圈住”郑振铎，正如胡愈之所说，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③。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

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④有位学者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⑤事实上,郑振铎在民俗学、艺术学、文献学、编辑学、博物馆学、社会学等方面,也均有精深造诣和重大建树。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郑振铎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例举几个较重要的问题来做点“证明”。

一 郑振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最主要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代表人物

其实这是该会众多发起人早就说过的了,只不过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视如未见。例如,叶圣陶多次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⑥郭绍虞说:“文学研究会之成立以振铎为骨干”^⑦，“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振铎是中心人物之一”。^⑧孙伏园说:“那时郑振铎先生奔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⑨征诸史实,该会的成立须从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组成《新社会》编辑小组讲起。该小组实际就是一个宗旨鲜明、颇具实力的新文化社团^⑩,于1919年10月前已成立,成员初为郑振铎、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略后许地山加入。从《新社会》的编辑出版实况看,该小组的核心人物无疑是郑振铎。郑是《新社会》发刊词起草者,发表文章最多,很多都登在打头位置。后来改出《人道》也主要是郑决定的,瞿秋白承认自己的意见“不足为重”^⑪。这五人除瞿秋白,都是后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⑫。该小组无疑就是文学研究会的胚胎或雏形。日本学者松井博光1979年在东方书店出版的《薄明的文学》,也认为从组成文学研究会的过程来分析,归根结底,其中心人物肯定是郑振铎。

该会的发动缘起,在1921年第二期《小说月报》上所发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第一部分《本会发起之经过》中有详细记录^⑬。考察郑振铎同另外11个发起人的相互关系,可更清楚地看到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该会与其他社团的关系。首先,郑、耿、瞿(世英)、许四人是原

《新社会》小组的成员,这不用多说。周作人是《新青年》社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革命提倡者;还不可忘记的是,周作人背后站着其兄鲁迅。用后来“创造社”的话来说,周氏兄弟是该会的“偶像”^⑭。从周作人日记可知,郑从1920年5月开始与周时常通信并见面,在酝酿发起该会期间来往更为频繁。朱希祖是周在北大的同事,也是鲁迅周作人留日时的同学,朱参与发起当是周向郑推荐的。周当时又参加了北大新潮社,并任该社的编辑主任,而郭绍虞、孙伏园、叶圣陶都是该社的社员。郭当时在北大旁听,与郑相识。孙则在编辑《晨报副刊》,郑从1920年7月初开始向该刊投稿。叶当时不在北京,因和郭是同乡,由郭向郑推荐而为发起人。王统照当时正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为曙光社的主要成员。《新社会》小组的成员大多在《曙光》上发表过文章,而郑、耿、瞿(世英)都参加了曙光社。蒋百里是共学社的主要成员,与商务印书馆当局也有交情,郑曾帮蒋编书。另外,蒋还认识沈雁冰(茅盾)。沈当时已在商务的《小说月报》做编辑,沈晚年回忆录中提到,当商务负责人要他主编《小说月报》时,他写信向未曾谋面的王统照约稿,却意外接到了郑的回信,说他与王是好友,并告以正在筹备文学研究会的情况,同时邀请沈作为发起人。所以如今“现代文学史”谈到该会的成立必首提沈、叶而不提郑,是不对的。除上述发起人外,我们不应忘记,郑当时还写信邀请鲁迅参加;另外,他还曾写信给田汉,请他和郭沫若作为发起人^⑮。1958年5月,郑振铎在接待山东师范学院教师、研究生来访时,回答了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提问。今存他写的问答提纲,在谈“这个会的前身”时,提到了新社会小组、人道社及新青年社、新潮社、共学社、曙光社。由上所述,该会确实与这几个社团有较大的关系。而手稿中还写到“北大的一部分人没有加入(胡适、康白情等)”,这是否意味着郑当时还邀请过胡、康诸人作为发起人(此事从未有人说过)?

总之,新社会小组(人道社)是文学研究会最初的发起单位,并且全员加入。内中的郑振铎更是核心人物,其后也一直是领导人。该会重要会员老舍之子舒乙在纪念该会成立70周年时统计的两组重要数据非常能说明问题。一为1921年初

至1925年底该会主要成员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数量的排名表，二为1921年初至1931年底该会主要成员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数量的排名表。这两个表中郑振铎都居于首位，而且都遥遥领先于第二位^⑩。

二 郑振铎是《小说月报》全面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幕后英雄，其后长期担任该刊主编，发表过大量优秀作品

《小说月报》的改革被公认为新文学前期最重大的实质性事件。历来的讲法都把功劳归于茅盾。但茅盾当时就说过：“《小说月报》今年改革，虽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编辑，而实在这个杂志已不是一人编辑的私物，而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⑪该会的发起和成立都在北京，仅从推理就可知道，北京的会员对这个上海出的刊物肯定起了重要作用。郑振铎后来回忆说，该刊“革新之议，发于耿济之先生和我”^⑫，与商务的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会谈后，“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⑬。据那时已在商务工作的胡愈之的回忆，当时高梦旦请郑振铎推荐一位新文学作者来编辑《小说月报》，郑回答：“你们所里面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⑭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讲，张、高回沪后于1920年11月下旬找他谈话，让他担当该刊的主编，并同意进行改革，这时离明年1月号稿件的发排只剩下两个星期了，但该刊前任主编所积的旧稿全不堪用，创作稿则一篇也没有。商务的负责人是相当精明的，自然知道这一情况，何以敢如此大胆地改换主编并同意改革？很显然，这必是因为他们已与郑振铎谈妥，对稿源有了把握。查周作人日记，周在12月5日即托人给郑带去为《小说月报》撰写和翻译的两篇稿子。可知郑至迟从11月下旬起，便开始为该刊的改革号组稿了。（许地山之哥许敦谷应郑之邀为该刊作画，则为11月28日。）当茅盾万分焦急于“无米之炊”时，郑从北京及时寄来了很多稿子。

郑振铎为改革号（1921年第1期）究竟出了多大的力？只要看看目录便能知晓。第一篇《改革宣言》虽无署名，但我认为郑必是参与了意见（详见下述）。第二篇为周作人文章，茅盾在回忆

录中说是郑寄来的。“创作”栏共七篇小说，茅盾回忆说五篇是郑寄来的，另两篇（慕之与潘垂统所作）是他“刚收到的投稿”；实际上他记错了，慕之即郑振铎^⑮，潘垂统也是郑组的稿^⑯。也就是说“创作”栏稿件全部为郑寄来。“译丛”栏共八篇，除了冬芬（即茅盾）与沈泽民（茅盾之弟）的两篇外，其余六篇也均是郑寄来的，其中包括了郑自己的译作。“书报介绍”为郑所作。“文艺丛谈”的五则中有三则是郑写的。最后“附录”栏《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当然也是郑寄来的。换言之，改革号的重要文章，大多是郑组稿或自撰。从题目上看，占到十分之七以上；从字数上算，约有六成。甚至这一期的封面和扉页插图，也是郑请许敦谷画的。因此，《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并非像如今的“现代文学史”和某些辞典上写的那样。郑振铎实则是更重要的幕后英雄。

该刊的《改革宣言》研究者皆认为是茅盾写的，现已收在《茅盾全集》中。但我却认为可能是郑振铎所写，至少郑必参与了起草，理由如下：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人（详见下述）。《小说月报》在全面改革的前一年，已由茅盾进行了局部革新，但茅盾前一年的文章（如10月号《本社启事》、12月号《特别启事》等）中，都只提到要“介绍西洋文学”，并未提及整理中国文学。而《改革宣言》中却明确地提出“同人认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须介绍与国人之必要，而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并说“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这个变化非常大，应是郑参与刊物的改革所致。在《改革宣言》后紧接着刊载的即郑的《文艺丛谈》，里面第一句话就是：“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更令人注意的是，这个任务甚至被置于介绍外国文学之前。而茅盾在同年2月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却仍在说：“我觉得这文题内所有的意义总不出（一）新文学运动的目的何在，（二）怎样介绍西洋的文学，（三）怎样创作这三者”，还是将“整理中国文学”

遗忘于新文学研究者“所有的”的责任与努力之外。翌年6月,《小说月报》“通信”栏发表的读者来信,批评茅盾主编该刊“于中国底文学,绝不想整理之而发扬之”,认为这“是一件不无遗憾的事”。茅盾的答复,接受批评并坦率承认自己确有“偏见”,“不大爱”这一工作。同年8月,该刊又载读者来信,责问《改革宣言》中既有“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何以年来没有这种文字发表?”茅盾在回复中也承认“未能尽什么力”。这一状况在郑继任主编后才有了明显改变。基于此,我有理由认为《改革宣言》中的有关整理中国旧有文学的内容,基本上应是郑振铎的而不是茅盾的想法。

在该刊改革后的第2期上,茅盾发表了他写的《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提到今后采用稿件不能由自己决定,而要请郑振铎在京会商鲁迅、周作人等,“决定后寄申,弟看后如有意见,亦即专函与兄,供诸同志兄审量,决定后再寄与弟”。这充分展现了郑对该刊的重要作用。此后该刊的重要稿件仍有很多是由郑组织、审定的。最有意思的是,第5期发表许地山小说《换巢鸾凤》时,文末有署名“慕之”的附注,称赞了该作品并高度赞扬鲁迅的小说“‘真’气扑鼻”。今人不察,以为此必是主编茅盾所加,大加称赞说是茅盾早期对鲁迅小说的精彩评价。精彩确实精彩,但实际是郑写的。茅盾晚年回忆说:“郑振铎之进商务编译所减轻了我的负担。他那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却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我因为担任中共联络员,跑路的时间多,就没有时间写信拉稿了。”^②因此,在郑正式担任该刊主编的前两年,如果称他为不挂名的副主编也是毫不夸张的。

郑振铎于1923年继任该刊主编,到1927年5月,由于他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并公开领衔发表了对反革命政变的抗议信,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避难,该刊才由他请叶圣陶代编。叶晚年在《我和商务印书馆》《重印〈小说月报〉序》等文章中,说此后郑是1929年2月回国的,而恢复主编该刊大概在5月间。此说大误^③。今看王伯祥日记,郑在1928年6月8日即已回到上海,而9月3日王的日记更明确写到振铎今日复任《小说月报》编辑,圣陶仍回国文部。可知有关文章居然把叶

代理主编的时间延长了九个月(很多“现代文学史”、巴金的相关文章等,说叶代理主编整整两年!)。而且,即使在叶一度代编时,该刊所印的主编名字也始终都是郑振铎。也就是说,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到1931年12月,即从第12卷到第22卷,两卷署沈雁冰主编,九卷署郑振铎主编。所以,茅盾1981年为《小说月报》影印本写序时说:“我觉得最令人遗憾的,是在《小说月报》这文艺园地上辛勤劳动九年的园丁郑振铎却在一九五八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他若健在,这篇《序》该归他写。”^④

三 郑振铎是新文学三十年史上长期主编全国最著名、最核心、引领全国文坛的大型文学刊物和丛书的第一人

新文学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我认为当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30年代出的《文学》《文学季刊》、40年代出的《文艺复兴》。而它们的主编都是郑振铎。《小说月报》上面已说过了,下面再说其他几种。

郑于1921年3月到沪工作后,即被《时事新报》社聘请参与编辑该报著名副刊《学灯》^⑤。不久,他争取在该报创办《文学旬刊》。4月23日,该报以头张头版位置刊出郑起草的《文学旬刊宣言》和《文学旬刊体例》。旬刊于5月10日正式创刊,两年后改为周刊,至1929年12月出至第380期终刊。一个文学旬刊/周刊能坚持出版这么久,在新文学史上很罕见。该刊开始两三年共百余期一直由郑主编。该刊出版两周年时发表的《给读者》,改为周刊时的《本刊改革宣言》,出至百期时的《本刊的回顾与我们今后的希望》等重要文章,都是郑写的。百余期后虽由叶圣陶、赵景深等负责,但郑仍然是编委会主要成员。正如赵景深说的:“在它的整个刊行期间,郑振铎作出了最大的贡献。”^⑥该刊是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首先,它与文学研究会“代用月刊”《小说月报》不同,公开标明是该会的机关刊。其次,它的出版周期短,反应快,批评性、战斗性更强,而且还重视理论,如郑振铎提倡“血和泪的文学”,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等文,就都是发表于该刊的。

30年代郑振铎在文学报刊领域最大的贡献，是他提议创办并参与主编了《文学》月刊。创办该刊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有两点，一是“左联”成立后曾出版不少刊物，但都未久即被当局禁止，“文艺杂志是文艺战线的重要阵地，左联自己办的文艺杂志已无法出版，出路何在呢？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方式才能不仅继续战斗，而且扩大战线的范围与影响？”^②这是当年一个大问题。二是1932年“一·二八”战事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炸毁，《小说月报》停刊，全国文坛缺少大型核心刊物。在此情况下，1933年春郑振铎专程从北平到上海向茅盾提出创办“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像当年的《小说月报》”的重大建议，立即获得茅盾和鲁迅的赞成。他们商定了“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③的办刊方针和编委会的名单。而具体物色编辑人员与联系出版社等重要工作均由郑负责。由于他的卓越的组织活动，使“左翼作家们和五四以来的一些老作家、名作家，也就能在同一个刊物上并肩战斗，这不仅使读者的范围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也扩大了”^④。该刊一直坚持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停刊。最后两期郑还以“编者”名义在卷首发表了三篇短论。在该刊出版一周年与二周年时，还先后单独出版了郑主编的纪念专刊《我与文学》和《文学百题》。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它算得上是三十年代上海大型文艺刊物中寿命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驰骋的阵地。”^⑤

1933年10月，郑振铎又在北平筹备创办了《文学季刊》。该刊原是北平某书店约文学青年章靳以编的，章觉得自己的资历和能力不能胜任，便去找郑商量，郑就一口答应参与主编。据章后来的回忆，郑当时指出：“《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⑥这其实就是办刊方针。该刊于翌年元旦正式创刊，声势也十分不凡，有360多页（后来还有450多页的），为当时国内最厚重的文学刊物。《发刊词》为郑起草。该刊深受读者欢迎，经常再版。创刊号就发表了鲁迅、瞿秋白化名之作。很多左翼作家都发表了作

品，郑自己更是发过不少，如《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一文，曾多次受到鲁迅的称赞，称其“真是洞见隐密”^⑦，并且还向国外友人推荐。该刊至1935年12月终刊。

抗战时期郑振铎也参与主编过不少刊物，包括主编大型的《文学集林》等，但由于烽火连天，国土破碎，难以发挥全国性影响。而抗战胜利后，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郑振铎与李健吾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该刊创刊于1946年1月，刊名是郑取的，《发刊词》也是他写的，“有气魄，也有识见，朋友们都说好”^⑧。该刊的封面设计就显示了战斗性^⑨。内容更是十分精彩，名家荟萃，佳作叠现，如钱锺书《围城》、巴金《寒夜》等都是在该刊连载的。该刊还提拔了许多无名作者如汪曾祺等。李健吾指出：“《文艺复兴》这份杂志，是日本投降后，上海方面出的唯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⑩该刊发行人说：“《文艺复兴》是填补了抗战胜利后三年真空的文艺园地，也是西谛心血的结晶，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相当一页的。”^⑪

郑振铎在主编《小说月报》、《文学》月刊、《文艺复兴》时，还曾分别为三刊主编出版过《中国文学研究》号外。他邀请了各时期全国一流学者专家写稿，实际就是对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集中检阅。这也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

郑振铎还主编过很多重要的文学丛书。早在1920年他就发表过《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随后即主编了“俄罗斯文学丛书”和“俄国戏曲集”。这是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丛书，对介绍俄国文学、推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鲁迅直到1932年底写《祝中俄文字之交》时仍郑重地提到，给予高度的评价。然而这还只是牛刀小试。

郑振铎对新文学史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该大型丛书的《缘起》《编例》《目录》等，都是他主持制定的。从1921年10月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多年间陆续共出百十来种。除了1927年5月后郑出国避难约一年间，该丛书由他委托胡愈之等人负责外（但这期间出版的书不超过十种），一直是他一人主编。而属于该丛书系统的他所主编的丛书，在20年代还

有“文学研究会通俗戏曲丛书”^⑧，在30年代还有“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⑨。因此，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系列，总数在150种以上，延续出版20多年，收入了鲁迅等100多位作家的各种体裁的创作、译作，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等，还引进了50来位外国作家的作品。而且并不局限于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著译品。就其数量规模、延续时间、内容质量、启蒙价值、历史影响等诸方面来说，在整个新文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郑振铎的这一巨大功绩，实在值得大书特书。就连老是贬低郑的台湾的研究者也说，该丛书“内容包括了文艺的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作家也包括了老的、新的、会内的、会外的。在新文艺的‘量’和‘质’的表现上，都相当可观。而那时的新进作家，由于得到了‘文学研究会’的提挈和培护而因以成名的，也实在不少。这是它最开明、最卓越，也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点”^⑩。

除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外，20年代郑振铎还主编了“童话”“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鉴赏丛书”等丛书，都与他当时主编的刊物或副刊有关。30年代他除了继续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等以外，还在鲁迅、茅盾大力支持下，以极大的精力主编了极有影响的“世界文库”。该文库是他在我国首创的与期刊相结合的丛书，所收都是中外文学名著，由生活书店从1935年5月起每月出版。虽然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迫下马，但正如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的：“以后再也没有人，也没有书店，有这样的气魄来继续这一工作。”^⑪虽因种种条件所限，该文库远远未能完成主编原订的计划，但还是收入了大量优秀作品；而它在文学史上留下永久魅力与佳话的，更在于郑振铎当时的一番宏伟规划与气魄。千百年后的读者在看到郑振铎当年草定的该文库的《缘起》《编例》《拟目》，也必然会为他的恢宏的目光、高度的事业心和旺盛的干劲所深深激动！

全面抗战开始后，郑振铎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出版了“大时代文艺丛书”。而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主持了一项可称为抗战时期最了不起的编辑出版工程，那就是编辑出版《鲁迅全集》。鲁迅博大精深、门类繁复的全集，称得上是一部“丛书”（《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中即收入了《鲁

迅全集》）。许广平说：“编辑责任，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复社则主持出版，代理发行”，“而实际责任，不得不集于少数人身上。”^⑫郑振铎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和复社的发起人，他就是负全集编辑工作责任的“少数人”之一。早在1937年10月19日他主持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就做出了由他负责催促商务印书馆从速出版《鲁迅全集》的决议。同月23日，他又主持召开新成立的文艺界救亡协会临时执委会，决定由他致函商务印书馆，请从速印行《鲁迅全集》。但后来因战事等因终未实现，郑振铎等人就决定自己筹款印行。《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也出自郑的手笔。后来，1941年出版《鲁迅三十年集》（全集的另一种形式），他也是主要负责人。

抗战胜利后短短几年里，郑振铎又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一些文学丛书，如“文艺复兴丛书”“大地文学丛书”等，而他在全国解放前夕最后主编的一套大型丛书是“美国文学丛书”。出版者赵家璧指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介绍一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作的成套丛书，洋洋大观，可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⑬

四 郑振铎是最早呼吁撰写完备的中国文学史的第一人，也是世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的作者

中国新文学运动绝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也不应该是完全否认传统文学，简单地割断自身与历史的联系的。新文学运动在对待文学遗产方面做得好不好，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可记取，可以深入研究；但我不能同意有论者所谓的“整体观”：中国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基本态度”，经历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片面的总体批判”，到40年代“片面的部分肯定”，一直到今天才到“重新评价”阶段。因为这种大胆立论，无异于认为新文学运动对于传统文学的态度从来就不曾不片面过。果真如此，那么新文学运动能取得历史性胜利就不可思议了。至少，郑振铎的“基本态度”就绝不是这样。我注意到在提出上述观点的论文中从未提及郑振铎。然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因为正是在这方面，郑振铎是最有代表性的数一数二的新文学人物，是绝对不能无视的。

早在1920年秋他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时就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一起作为新文学工作者的任务，这在新文学史上是首次；而且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亦独一无二。他当时就提出了须对旧文学“重新评价”。他一生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总字数超过300万言。他更撰著了15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他还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最早提议国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人。

1922年他发表了《我的一个要求》，在新文学史上首次提出必须要有一本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他批评了此前国内出版的寥寥几本粗陋不堪、体例混乱的文学史，也批评了英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指出当时还没有一本像样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从事文学史的撰著工作。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总计撰写出版了四种文学史：一是四大册的《文学大纲》，为世界文学通史性质，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为断代专题史性质；三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册，为通史性质；四是《中国俗文学史》二册，为分类史性质。在新文学工作者中，以一人之力做出如此成绩的，没有第二个人。关于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已经有很多论文写过了，这里只谈谈《文学大纲》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

早在1827年，德国大文豪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思想。但是，一部记叙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史书，却是过了近百年也未问世。1921年初郑振铎在《小说月报》改革号上的《文艺丛谈》中，首次提出了一本世界文学史“几时才得出现”的问题。1922年8月他在《文学的统一观》中又提出了“深深的希望第一本的人类的文学史的出现”^④。1923年10月他为《俄国文学史略》所写的自序中仍在说：“我们没有一部叙述世界文学，自最初叙到现代的书。”^⑤可见，他认为直至20年代初，我国以及世界上还没有一部真正可以称得世界文学史的书。我认为他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环顾当时世界，名为“世界文学史”的书虽

已出现，但犹如凤毛麟角，而且以绝非苛求的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显然还称不上“真正的”三字。1925年初，郑振铎发表《各国“文学史”介绍》，说自己“致力于搜集这一类的书籍已有五六年”^⑥，但他所知国外出版的世界性的文学史书，却只有三四种而已^⑦，国人写的则一本也无。例如，1922年美国波斯顿出版的李查孙与欧文合撰的《世界文学》，自称是第一本世界文学史，但全书共526页，其中说到中国文学的地方，与日本文学加在一起仅2页！1923年，英国伦敦开始出版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也基本相似。而郑振铎此时尚未看到的1925年美国出版的玛西的《世界文学史》，后来广泛销行，还被译成日文与中文，被称为“实在是一部完美的文学史”；但原书共559页，叙及东方文学的却只有16页（不到全书百分之三），且仅限于古代；其中谈中国文学的地方，竟不足2页！除了上述西方人写的这类少而又少、名不副实的书以外，东方只有薄薄的一本1907年东京博文馆出版的桥本忠夫《世界文学史》。该书正文共278页（若译成中文最多七八万字），写到中国文学的仅3页半，且近半是空话，可知其疏漏。此外，日本东方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大纲》有十几册，自1926年开始出版，不仅迟于郑振铎《文学大纲》，而且名不副实，每册只写一个作家。这就是当时《世界文学史》撰写的实况！

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是：一部世界文学史，如果仅仅论述西方文学而过于忽略了东方文学，特别是有意排斥或无知忽视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有着四千年文明的中国的文学，那就再也不能称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史了。而正如郑振铎指出的：当时“大约欧洲人作的文学通史都不免有此弊”（《各国“文学史”介绍》）。值得提到的是，玛西对于这一点倒是有所认识的。他在所撰《世界文学史》的《神秘的东方》一章中诚恳地写道：“在本书中，我们必须犯着荒谬的不匀称这个罪过，而只将短短的一章述到那较之我们的文学更古，恐怕又更高明的四五国民的文学。这种不匀称，在或一程度，可以用全然的无知来辩解。”在这一章的最后，他又说：“对于至少在过去的三十世纪之间，一向是高尚的文明底制度的中国这样的文学，只有三分钟的一瞥，这实在是对于时代精神的荒谬的违反。”^⑧

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共约80万字，其中中国文学部分约20万字（以上数字均已将插图所占篇幅除外）。1923年下半年起撰写，边写边发表，自1924年1月起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至1927年1月止，共连载三年余（其中还有些补充章节发表于《一般》等刊）。1926年7月，他重写了《叙言》，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于年底出版，第四卷1927年10月出版。这实在是一部呕心沥血的巨著。我认为，这不仅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通史，也是整个东半球较早出现的此类专著，而且还是世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郑振铎一举突破了当时由西方人和日本人所著的有限几部文学通史的严重弊病与局限，这是自近百年前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伟大思想之后的一次破天荒的学术实践。玛西在他的《世界文学史》第三章《神秘的东方》的开头，曾引用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两句诗：“愿‘东’与‘西’一息之隙也没有地融合其朦胧的光，/像生死之境一般，扩之而成无涯的昼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正是郑振铎这部巨著，胆略宏伟，气吞全球，首次使远东与泰西的文学历史平等而紧密地结合在一书之中，相互辉映，朗照中天，扩之而成无涯的文学的白昼。

玛西的那本书，在郑振铎此书已在刊物上连载一年多以后才出版，而且还经过西方很多专门学者分别审阅过。请看看这位公正的洋人在书中是怎样说的吧：“然而……单就智底问题而言，住在亚细亚的东方及南方部分的民族，直至最近，还仿佛他们住在别一星球似地遥远。”而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从第一章《世界的古籍》开始，就充分论及东方与中国。全书专门论述东方文学（包括中国）的章节文字，约占全书的一半篇幅；专门论述中国文学的部分则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这样一个总体格局，从宏观上看，就是十分科学和合理的，真正打通了全人类的文学世界，使人们认识到：“文学的园圃是一座绝大的园圃；园隅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圃的风光有关系的。”（郑振铎《文学大纲·叙言》）此书在横向空间上彻底破除了陈腐荒谬的“欧洲中心论”，这本身在人类文学史上就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五 郑振铎是发现、提携一大批著名作家如老舍、巴金、王任叔、许杰、萧乾等人的第一或最大的伯乐

郑振铎是一位非常热心诚恳、团结面广、“爱友若命”（郭绍虞语）的人，他长期身居文坛中心、长期领导主持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丛书的工作，他眼光敏锐又有伯乐之才，所以在他一生中发现、帮助、提携、培养的作家及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和编辑者的数量实在不少。这是他对新文学事业重大贡献的又一个方面。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老舍的小说处女作与成名作《老张的哲学》，是1926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的。据老舍回忆，当时他在伦敦大学教汉语，业余写了此部小说寄给了郑，而且是马马虎虎地用纸卷一卷就寄出了，不料就得到了郑的青睐^⑨。在发表之前一期该刊的《最后一页》中，郑振铎就预告：“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的作家们所未弹奏过的。”第7期开始发表时，赫然登在首篇。郑在该期《卷头语》中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小说数量之少，真使人惊诧”，“且看屠格涅夫一生重要的作品有多少，杜思退益夫斯基有多少，托尔斯泰有多少，佐拉、莫泊桑有多少，史格得、狄更司有多少，‘质’的一方面姑不要说，就‘量’的一方面而论，已经要使我们愧死了！”“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新进作家，你们应该如何的努力！”我认为这主要就是对老舍说的，因为在这期上只发表了老舍一人的小说创作。老舍后来成为长篇小说创作最丰的大作家，肯定与郑的激励和帮助有关。《老张的哲学》至年底登完，郑又在第12期《最后一页》特意指出：“今年所登的创作，《老张的哲学》特别的可以使我们注意。”并预告说：“明年老舍先生还有一部《赵子曰》，一部比《老张的哲学》更重要更可爱的长篇，将在本报发表。”还做了内容介绍与评价，认为是可以“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而悲愤”的佳作。这段话最早指出了老舍小说的基本特色，后为朱自清等人所赞同。1929年郑振铎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老舍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以上三部小说

都是老舍在国外写了寄回国的，而1930年春老舍一回国，就被郑请到家里住，并在郑家写完了长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老舍创作向革命方向转变的第一部小说《黑白李》，也是郑发表于《文学季刊》创刊号上的。在郑振铎逝世周年纪念会上，老舍声泪俱下地说：“郑振铎的一个特点是爱朋友。他有热情，见你有一技之长便帮助你。他不给你浇冷水，和‘百花齐放’政策一样，从不浇冷水。他不是一个平凡的朋友。你有一点好处，就鼓励你前进。”⁵¹

巴金晚年写过一篇《我的责任编辑》，第一句话便是：“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⁵²很多研究者更百口一辞强调这点。但这不符史实。巴金最初在文坛露面，是在郑主编的《文学旬刊》上。1922年7月，巴金以“佩竿”笔名在该刊发表了最初的创作《被虐者底哭声》（诗），正是响应郑的“血和泪的文学”口号的。随后又陆续在郑帮助下发表一些诗文。9月11日该刊还发表巴金来信，表示热烈拥护郑振铎关于文学“应该与这腐败的社会争斗”的思想，并对郑诗《悲鸣之鸟》表示极为佩服，请求郑“常通信教导我”。1923年5月，巴金在成都《孤吟》杂志上发表诗《报复》，也是在郑振铎《死者》一诗的启发下写成的。可见，郑在文学思想与创作上都对巴金有重要影响。而巴金在晚年说不认为这些是文学作品，强调其“第一本小说”《灭亡》才算。然而《灭亡》也正是由郑振铎连载发表在他主编的1929年《小说月报》上的（这时叶圣陶已经停止代理编辑该刊四个多月了）。小说载完后郑在该刊《最后一页》中说：“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是谁，这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在这一年该刊最后一期《最后一页》中，郑还特地提到《灭亡》，说“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权威刊物的这些编者按对巴金的鼓励有多大，可想而知。巴金自己也多次说过：“在发表《灭亡》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作家’。”⁵³随后，巴金第一篇问世的短篇小说，也是由郑发表的。

值得一说的是，巴金后来多次提到郑退过其稿子。如1982年春，巴金在回答某学生提问时，就讲到其记得“1924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

的短篇，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⁵⁴。那是郑在《小说月报》上发起征求“非战文学”启事的应征稿。在《灭亡》发表后，巴金又于1930年春寄去第二部长篇小说《死去的太阳》，郑振铎却在巴金已一举成名的情况下做了退稿处理。巴金当时不服气，又找了一个地方发表了，但很多年后巴金还是诚恳地承认郑的“处理是很公平的”，“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⁵⁵。可见，这正是郑振铎对巴金的另一种形式的帮助。这以后，巴金继续得到郑振铎的帮助，例如1933年底，巴金就住在郑家创作了《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巴金后来深情地说：“我一直敬爱他”，他“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三十几年来有不少的人得过他的帮助，受过他的鼓舞，我也是其中之一”⁵⁶。

郑振铎发起征求“非战文学”时，有一个新作家的应征稿被采用了，那就是许杰。许在晚年写的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中说：“我在《小说月报》上最早刊出来的便是一篇读后感，其次是一篇类于诗又不像诗、是散文又不像散文的抒情文章《祈祷》。以后引起大家注意的，而且得到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里特别提起的，就是《惨雾》。”他说的那篇“读后感”载1923年3月号《小说月报》，《祈祷》载同年6月该刊，可见许之登上文坛也全与郑有关。而许的成名作《惨雾》，就是看了郑在该刊发起征求“非战文学”后赶写出来，并亲手交给郑，载1924年8月该刊。不过长期以来人们片面理解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对《惨雾》的评价，将其性质局限于“乡土文学”一面，没有注意到它更是“非战文学”，尤其没有注意到这篇小说与郑的关系。许杰认为应该指出这一点。许还指出：“这篇作品对我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以前我发表的是读后感或抒情散文之类，真正的通过故事与人物的遭际来体现主题思想的小说创作，就从这一篇《惨雾》开始。”“郑振铎对这篇小说还比较满意，于是引起我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⁵⁷

与许杰同为浙东青年的王任叔（巴人），更早就得到郑振铎的提携。1922年5月，王给《文学旬刊》郑主编寄去一篇《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评论了诗人徐玉诺的作品，被立即刊登在该刊。这是王首次发表的文字。6月1日该刊上，郑又发表王的来信。信中说，他当时写了一本诗《恶魔》，“鼓足勇气”寄上，“先生看了这些诗如谓艺术林中可占一位的，那就不妨为我出一专集。如谓艺术手段还差，内中或有好的，那末不妨择好发表。如谓都是不好的，那末还是寄给我还再来堆在书堆中吧！”因为王没写回信地址，郑就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回信说：“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陆续选登出来。”从这一期起，该刊选载了王的《遣闷》等诗。7月1日该刊，又发表王的来信，激动地说：“承你的厚爱，奖励到我要哭了。”同年8月21日，该刊又开始发表王最初的小说，特别是10月10日该刊发表王的《吃惊的心》和《大树》，郑并且在同期《杂谭》中指出：“中国的小说，向来少有真实的生活描写。所以‘农民小说’，中国是没有的”，而王的这两篇小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创始之作”。这对王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极大的鼓励。1923年，郑接手主编《小说月报》的第一期，还一口气发表王的四篇小说及六首《山居杂诗》。在这前后，郑亲自介绍王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郑逝世后，王在《悼念振铎》中说：“我从事于文学事业，他无疑是我的导师和益友。这不仅因为在他的许多的著作中，使我增加了不少的文艺知识，而且还因为他的一些著作中某些健康的思想，使我敢于直面人生。”^⑤直到王晚年写的自传中还强调：“一生中，文学事业上给我以最大帮助和影响的是郑振铎。”^⑥

这样的事迹还可以举出郁达夫、许地山、徐玉诺、顾仲起、燕志儒、赵景深、赵家璧等，限于篇幅这里最后就说一位比较年轻的萧乾吧。萧是1933年入学燕京大学后与郑相识的。1996年10月23日萧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我与商务》，深情地写道：“我最早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出版关系是在1935年……商务一口气出版了我最早的三本书，即《篱下集》（小说）、《小树叶》（散文）和《书评研究》。一个二十五岁初出茅庐的青年，怎么会那么大走文运？这就使我想到已故郑

振铎先生。……当时对我来说，那不啻是雪中送炭。”萧就是靠这些书的稿费得以读完大学的。还值得指出的是：一，当时郑因与商务资方闹翻而刚辞职，因此这时他向商务推荐一位青年人的三部书稿决不是一件容易事；二，此时郑领导的文学研究会实际已近解体，而且萧原本就不是会员，郑却把他的两本书收入“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三，萧是燕大新闻系学生，而郑则是中文系老师，萧并非郑的“嫡系”弟子；四，萧当时还轻信了某人对郑的污蔑，在报上发表了《悼〈文学季刊〉》跟着攻击郑。因此，郑这样大力提携和帮助萧实在是极其感人的。

六 郑振铎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前身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也是左联解散、成立新的文学团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左联发起人之一钱杏邨晚年曾指出：“在左联成立之前，有一件事是值得说的，那就是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立。这件事与后来左联的成立有直接的关系。”^⑦这一重要论述在左联成立50年后首次提出。但此说绝非孤证，左联最初成员冯润璋也郑重指出：“这个协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没有起过多大作用就自动解散了，但它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认为这是酝酿左联的第一阶段，是值得提出并注意的。”^⑧据钱杏邨回忆，当时他曾在《海风周报》上化名写过关于该协会成立的消息。今查该刊，1929年1月第2期所载《国内文坛消息》（署名“鲁亚”）是这样报道的：“中国著作者协会，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已于1928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于是日下午二时假上海北四川路广肇公学开成立大会。计到郑振铎，孙伏园，张崧年等九十余人。选举结果，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郑振铎，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九人为执行委员，钱杏邨，冯乃超，王独清，孙伏园，潘汉年五人为监察委员。”根据钱的回忆和上引消息所披露的该协会领导人名单，我认为它虽然不称为文学社团，但无疑正是左联的前身。因为，它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中的郑伯奇、沈端先、钱杏邨、冯乃超，

后来都是左联成立时的常委，已占左联常委人数一半以上。而据1929年1月出版的《思想月刊》上公布的该协会发起人名单，中有夏衍、沈起予、洪灵菲、彭康、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等，这些人后来都是左联的发起人，并也已占左联发起筹备人的半数以上。另外，潘汉年等共产党干部以及很多知名左翼作家也都已在内了。

郑振铎是1928年6月回国的，可知他回国后不久就参与了该协会的发起工作。参考反面材料——杨甫在1933年9月写的《普罗文艺运动史》，又可知郑正是该协会的主要发起人。据杨甫说，就在郑回国后，张崧年到上海，看见出版事业颇有蓬勃气象，便想来干一番事业。但是虽然张的资格很老^⑥，但张在上海出版界、文化界没什么根基，也缺乏组织能力，于是他找了郑，想组织一个文化团体。张找对人了，因为郑正有着丰富的社团组织经验，而且在出国前就曾在上海参与发起过“上海著作人公会”，该公会的《缘起》里还表示过今后要组织“全国著作人联合会”的意望。虽然，随着大革命失败该公会已不复存在，但基础还在，郑回国后也正想重整旗鼓，继续奋斗。更重要的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更好地开展革命文化运动，特设了一个直属江苏省委的“文化支部”，来作为领导文化运动的中心机关；但党还缺少一个公开的文化团体。为此，当郑、张等人发起这样一个协会时，就正好符合革命事业的需要，得到了党的支持。

钱杏邨回忆说，该协会宣言“是我们几个人起草的”。我认为起草者中一定有郑振铎，因为该宣言的思想以至用语，都与郑参与起草的《上海著作人公会缘起》和郑后来写的《编辑者发刊词》极其相似。虽然该协会实际活动时间很短，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大型文化团体。其发起组织的经验，包括缺点和教训，都成为随后成立的左联的借鉴。因此，郑振铎参与发起该会，不仅是他一生文学组织活动中的大事，也是左翼文学运动史上必须提到的。而现在的所谓现代文学史却完全不提。

1930年3月左联正式成立，但作为其前身组织的主要发起人郑振铎却被排除在外，这当然是错误的“关门主义”。这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说。而到1936年，郑却又成为解散左联、成立中国文艺

家协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重大史实，所谓的现代文学史也是完全不提的。但由于主要当事人发表了回忆文章，此一史实是无可否认的。

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与夏衍《懒寻旧梦录》中，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当时商量左联解散这一大事有三个人经常碰头研究，那就是夏衍、茅盾与郑振铎。有好几次还在郑家里。夏衍是左联发起人之一，又是地下党文委的主要负责人；茅盾曾任左联行政书记，是当时国内地位仅次于鲁迅的文坛领袖。而郑既不曾加入左联，又不是党员，怎么也置身这一大事的核心圈呢？这除了因为他当时确实是左翼重要作家以外，我认为一定与左联驻莫斯科代表萧三在中共上级指示下写的一封信有关。

信是1935年8月11日写的，经过万水千山，又由内部交通送到鲁迅手里，然后转给左联及文委领导人（此信许抄原件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该馆在1983年2期的《纪念与研究》上首刊此信）。信中严厉批评了左联过去犯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信中又充分肯定了当时在大众语讨论、推广手头字运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的签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讨论等工作中的“联合战线的成功”（按：这些事郑振铎都是重要参与者）。信中不仅指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而且特别提到应该重视以前“人权保障大同盟”的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从来没有被左联利用过，其实文学界的郑（振铎）、陈（望道）……亦何尝不可以作政治组织的宋（庆龄）、蔡（元培）……”这里，以宋、蔡在政治组织中的地位，来期许郑振铎在文学界的作用，非常值得注意。这不仅是对郑政治上高度信任，而且也是高度肯定了郑在文学界的组织活动能力。郑参与左联解散核心小组工作，显然与这个指示有关。

这里，有必要谈到鲁迅在解散左联与成立文艺家协会一事上的看法，包括对郑振铎的一些看法。这是一些研究者避而不谈的。虽然，这些看法多是当年鲁迅在私人书信中非正式发表的，但这些信公开已久，我们不应回避。茅盾回忆录中

提到,“鲁迅对萧三的信取看一看再说的态度”,一开始不赞成解散左联。鲁迅对战斗的左联的深厚感情,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视,对资产阶级文人的警觉等,都是非常可贵的;但他的某些估计未必完全正确。由于当时左联的某些领导者未能充分尊重鲁迅,有的情况未能及时同他商量、通气,加上已有的成见与隔阂,使鲁迅对有些内幕并不了解。例如,1936年5月2日鲁迅致徐懋庸信中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①这说明,关于解散一事鲁迅听说后,便无下文,更没有与之仔细商量。这当然是很不应该的。但鲁迅说的“别人参加了意见”指谁呢?是国民党方面吗?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只能是指郑振铎(以及胡愈之、陈望道等)这样未正式加入左联的进步人士。然而,为何说这样的同志参加了意见就是“溃散”呢?

当时,郑振铎受有关方面委托,出面组织文艺家协会。鲁迅对此也很反感。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一再提到此事。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鲁迅确实对“内幕如何,不得而知”。例如,关于这件事的主持者,鲁迅先认为是郑振铎,继而听说是茅盾与郑振铎,后又说是傅东华与郑振铎主持、茅盾参加,最后又说主要是傅东华。实则傅并没起什么重大作用,地位更从未居于郑之前。关于解散左联的意图,鲁迅以为乃在救《文学》月刊,这也显然不确。为一个刊物何必以解散左联为代价?我认为,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在这方面有误解,也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这件事上的作为。

1936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但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郑振铎却没有出席成立大会。是何原因?令人纳闷。可能与该协会最后未能得到鲁迅参加,而郑振铎又受到误会有关。但郑仍被大家推选为理事。不管今人对解散左联和成立文艺家协会一事做何评价,郑振铎当时确实是听从党的决定而去做的。茅盾后来回忆,郑对解散左联一开始也是有点“迟疑不决”的,但后来有关方面“开诚布公地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何以要这样决定,这样决定对国家民族又有什么好处”,他也就“欣然乐从,鼓起精神,来干委托他干的工作”。茅盾说,“这在当时是要有点牺牲精神的,因为,万一不济,小则坐牢,大则会丢了性命”,“虽然他对于那时的形势、党的政策,未必全部彻底明了,可是他还是起劲地干了,因为他信任党。”^②夏衍后来说:“郑振铎……和‘左联’保持了很密切的联系。……在坚持联合、反对分裂这个问题上,他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③

①鲁迅编:《引玉集》末页,三闲书屋1934年版。

②郑振铎:《汤祷篇》,“序”,第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胡愈之:《哭振铎》,《光明日报》1958年11月1日。

④端木蕻良:《追思》,《北京日报》1978年11月12日。

⑤周汝昌:《茅公风范》,《文汇报》2001年2月14日。

⑥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

⑦郭绍虞:《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⑧郭绍虞:《“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文艺月报》1958年第12期。

⑨孙伏园:《怀耿济之》,《新民报晚刊》1948年2月6日。

⑩《新社会》被迫停刊后,由该小组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时,即对外称为“人道社”。该社是当时最进步的社团之一,曾与李大钊等人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等人的“觉悟社”等一起,组合成名曰“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

⑪瞿秋白:《饿乡纪程》,见《新俄国游记》第4节,商务印书馆1922年影印版。

⑫瞿秋白正好去苏俄,不然肯定亦为发起人;但瞿在回国前即加入了,回国后又任《文学旬刊》编委。

⑬这是郑写的,该报告第二部分《成立会纪事》中即说明在成立会上“首由郑振铎君报告本会发起经过”。

⑭郑当时也曾邀请鲁迅,据说鲁迅因“文官法”限制而不参加,但与该会关系极深,周作人起草的该会宣言即经鲁迅审读。

⑮但田汉竟不转信。后郭沫若又因自组创造社,所以未参加。

⑯舒乙:《文学研究会和它的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

⑰茅盾致李石岑信,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2月3日。

⑱郑这样说不想独自居功,而最初去找“北上访贤”的

- 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时，他是拉着耿一起去的。见张元济1920年10月23日日记手稿。
- ①⑨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第3页，开明书店1934年版。
- ②⑩胡愈之：《我的回忆》，第13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⑪该篇已误收《茅盾全集》，经我指误，在全集出全时《茅盾全集》编委会在后记中承认了错误。
- ⑫1921年3月3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手稿）提到“潘垂统兄的稿费”，可知该稿由郑经手。
- ⑬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 ⑭当是叶圣陶老年记忆失实，也可能文章乃他人代笔，而那个时间是他人错算的。
- ⑮《〈小说月报〉索引（1921—1931）》，第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 ⑯7月17日起，正式担任该副刊主编，至翌年1月底辞去。
- ⑰赵景深：《〈文学周报〉影印本前言》，《〈文学周报〉影印本》，第1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 ⑱⑳黄源：《左联与〈文学〉》，《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 ㉑㉒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 ㉓靳以：《和振铎相处的日子》，《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 ㉔鲁迅1935年1月9日致郑振铎信，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㉕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上海文化》1946年11月号。
- ㉖第一卷选用欧洲文艺复兴时米开朗基罗的《黎明》，意味着抗战胜利，人民觉醒，国家有前途了；未久，国民党策动内战，杀害闻一多，人民怨恨极了，于是第二卷封面改成米开朗基罗的《愤怒》；第三卷封面又改为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真理睡眠，妖异出世》，喻指当时“国统区”民不聊生、一片黑暗的状况。
- ㉗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 ㉘刘哲民：《西谛与〈文艺复兴〉》，《新民晚报》1982年1月31日。
- ㉙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套剧本创作丛书，而且除1940年代后期孔另境编的《剧本丛刊》以外，新文学史上专门的剧本丛书极罕见。
- ㉚而这时文学研究会其实即将或已经解体了，而他仍以该会名义编这两套丛书，其宗旨也还是为了贯彻他的初衷，即建设我国的新文学事业。
- ㉛陈敬之：《春云初展的文学研究会》，《畅流》（台湾）1965年第3期。
- ㉜茅盾：《一九三五年记事》，《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 ㉝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20卷卷末，1938年复社版。
- ㉞赵家璧：《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读书》1980年第10期。
- ㉟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小说月报》1922年第8期。
- ㊱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第1页，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 ㊲郑振铎：《各国“文学史”介绍》，《小说月报》1925年第1期。
- ㊳当时郑振铎与国外学界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也很注意访购国外学术书籍，所以他所撰写的这份书目相当齐全。尽管它仍有遗漏，且主要只是英文书，但当时国外有关世界文学史的书极其稀少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 ㊴实际上，此书关于中国文学部分的内容，是连“三分钟一瞥”都没有的。这里引用此书的文字为1931年开明书店版胡仲持译《世界文学史话》第28—30页，下同。
- ㊵有人称这部小说是寄给鲁迅的，不确。1926年9月30日老舍致胡适信明确说“寄给上海郑振铎”。
- ㊶老舍发言记录，未刊，由老舍女儿舒济提供。
- ㊷巴金：《我的责任编辑》，《大公报》（香港）1986年5月5日。
- ㊸巴金：《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
- ㊹《巴金谈文学创作——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文学报》1982年4月1日。
- ㊺巴金：《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
- ㊻巴金：《悼振铎》，《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1日。
- ㊼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 ㊽巴人：《悼念振铎》，《光明日报》1959年10月18日。
- ㊾王任叔手稿，未刊，由王任叔儿子王克平提供。
- ㊿吴泰昌：《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 ①冯润璋：《从中国著作者协会到左联》，《现代文学》（陕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1984年第1期。
- ②张崧年甚至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 ③鲁迅：《360502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④茅盾：《悼郑振铎副部长》，《新文化报》1958年11月1日。
- ⑤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26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郑振铎研究所]

责任编辑：萨支山